



希望了解更多“新视界”报道内容,欢迎关注微信公共账号“新民锦读”。这是一支图文并茂的“锦读”,精心、精致、精彩。值得您的时间,值得您的收藏。

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| 第44期 | 2014年3月22日 星期六 责编:姜燕 视觉:叶聆 编辑邮箱:xmjdb@xmw.com.cn

新视界



新民图表

制图 叶聆

摄影 本报记者 张龙

上海最后的渔民

本报记者 王文佳 朱全弟

“没有人想读书,年纪一到就上船打渔;出海一次就是三个月,有时鱼多得让人七天七夜不舍得合眼,一网上来鱼多得人都可以在网上走。”——这是上世纪80年代金山渔民的工作写照。

然而,仅仅20年之后,那里渔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让自己的孩子好好读书,考出去,哪怕要倾尽积蓄、四处借款,哪怕孩子见到了外面世界,再也不愿回来。

上海,这个有着6000多年渔业历史的城市,如今剩下的渔民已经不足万人,最年轻的也已经超过40岁。捕不到鱼,赚不到钱,这个曾经让外人羡慕不已的职业如今已经成为了他们心中的痛。“我们估计是最后一代了。”不少渔民这样说。



■ 休渔期,青浦的渔船都停靠在小码头内 本报记者 王文佳 摄

“渔民”曾是镶金边的工作

金山区山阳镇渔业村滨临杭州湾畔,这个坐落在沪杭公路北侧的小村庄,与海中的金山三岛隔海相望,人们也把这里叫做金山嘴渔村,或者,上海最后的渔村。姜满龙就是这个村子中的普通一员。他今年51岁,17岁初中毕业就跟着村里人开始了捕鱼生活。

在那个年代,村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像他一样,初中毕业就上船,没有人想着读书深造,也没有人愿意从事其他的行业。原因简单说就是两个字,赚钱。“那时候鱼多得都捕不过来。”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上海最早的万元户村就诞生在这里。1985年,全村400多个渔民,每年每户平均收入过万,全村人均收入也达到4600多元。和当时周边几个农业村比起来,这是个令人羡慕的天文数字,就算拿到全国范围去比,也绝对是佼佼者。

当时,“渔民”是个镶金边的工作,哪个孩子都是日里夜里地巴望着,等着初中毕业后上船赚大钱的那一天。即使村里用免费教育、升学补贴等优惠政策吸引他们,也几乎没有人为之所动。陆雪云说起当年的渔村风采,总是特别激动,“要不是村里担心文化贫瘠,非得卡着初中毕业这条红线,想必渔民上船的平均年龄还得下降一大截。”

陆雪云是那时候村里的支部书记,当了16年的船老大,也被评过市劳模。老人今年已经77岁,早已退休,但对现在渔民的生活他还是格外关心。当年不少听他调遣的小船员如今成了船老大。可是船小了,鱼少了,生活水平也下降了。当年船老大眼神中流露出的那份冲劲和锐气很少能再看到了。

喊“鱼老万”无人不识

陆雪云说,渔村的渔民生活也像海浪一样一波三折。上世纪50年代,他刚上船的那会,设备还很落后,只能四五个人驾着“小划子”,也就是自己做的小木筏,在很近的海面做些简单的捕捞。计划经济的时代虽然算不上富裕,但是温饱是肯定解决的。就算是三年自然灾害,有鱼吃,村里人也都饿不着。

后来渔船进步到木帆船、机帆船,直到100吨级的大型渔船和钢质渔轮。渔民也把战线延伸到了更远的海面。虽然死人的事年年发生,但是危险的远方却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勇敢者,在老一代渔民的眼中,那里鱼多得让人无法抗拒。

出海时,一个船队30多艘远洋船浩浩荡荡开赴远离上海吴淞口300海里外的大陈岛东南海域或济州岛北的海洋上。两艘船共同牵引一张大网在海面上拉开。“那网有四五十米长,网纲绳足有碗口粗。收网的时候海面上就像浮起了一个鱼山。一网上来,少说也有200担。”回忆自己做船老大的经历,陆雪云满是骄傲:“我们是绝对的高产船,在1994年前后,一年能赚十几万。”

渔民们在海上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。一个冬汛,可能3个月不回家。经常几天几夜合不了眼。当然成果也多。全村460名渔民,在1986年到1990年的5年中,捕了16855吨鲜鱼,按全村人头平摊,每人每年捕捞量达7320公斤。

村里建起了银行、药店、派出所、邮电局、学校,甚至比镇里的公共设施都齐全。现任村支书陆宇峰1985年到部队当兵,山阳镇其他村子的人去当兵,每年的补贴标准是300元,唯独他,补贴费高达1万元,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鱼老万”。“喊陆宇峰没人知道,但是喊‘鱼老万’没有一个不认识的。”

最年轻的渔民年近半百

陆宇峰清楚地记着这样几个数字,现在村里1896人,真正的渔民只有100个出头了,渔船也只剩下18艘。“村里最年轻的渔民也已年近半百,再也没有孩子愿意出海打渔。”

“这活太累,起早贪黑不说,还经常遇到危险。”姜满龙的声音里夹带着几分沮丧。出海的日子,每天都是一场战斗,和天斗,和浪斗,和鱼斗。斗了30年,似乎有些倦了,身子骨也大不如前了。

“现在,鱼少多了。柴油价格蹭蹭往上涨,船开得远了,成本都收不回来。”老姜的船每天也就开出去七八海里,大约1个小时的路程,“这样国家的柴油补贴算下来还勉强能混混。”渔民不光要捕鱼,还得自己负责到市场上卖鱼,“收入都是靠天吃饭,鱼少的年岁,一家两口子一年也就

赚个两三万元。”

“你看我现在皮肤这个颜色,是因为之前几个月都没出海。捕鱼的时候要比现在难看很多。”说起现在的捕鱼生活,姜满龙脸上布满了愁容:2到4月是捕鳗苗,但是今年这价钱跌得让人心慌;5月有一个月可以捕凤尾鱼,可是除了下网收网的时间,中间也就20天,身体吃不消,很多人都不愿意捕;6月1日到8月20日是休渔期,不能出海;8月底到10月底可以捕白米虾,只有开禁之后的一个月鱼多,但是捕多了来不及拣,不拣就卖不出去,紧接着又是鱼少得可怜的一个多月;11月之后,又要修船和准备工具。“一年下来,真正捕鱼没有几个月。垃圾多的时候,80%都是垃圾。”

打渔困难,陆奇龙就开起了饭馆,从没有正规房子,只是沿街摆个摊,到如今成了“海鲜一条街”18家餐馆中响当当的“天桥饭店”老板。他也是个成功转型的典范了。饭店生意不错,但是问他有多少海鲜是村里渔民去打来的——老陆有些犹豫,“其实,现在鱼越来越少了。渔民打不到鱼的时候,我们也只能从外地进货,江苏、浙江的都有,甚至不少是铜川路市场拿的货。”

渔民们为环保作出牺牲

2月15日到5月15日,是淀山湖的禁渔期。在青浦朱家角镇淀山湖一村,渔船都停靠在一个没有名字的小码头内,湖边的水清澈到可以看到湖底的石子。“这几年保护淀山湖还是卓有成效的。环境好了,但是渔民却作出了牺牲。”村支书姚德林这样说。

如果不是禁渔期,55岁的沈爱弟几乎没有一天可以睡到自然醒。每天凌晨,万物静寂之时,他就从睡梦中醒来了,看看星空,判断今天是个好天气,点一盏电灯就驾着船驶入了夜色中。“一般都是凌晨一点出发,上午10点回来,到中午,太阳就太烈了,扛不住。”

如今的生活和小时候比当然是好了很多,在他11岁之前,甚至没有一栋像样的房子,爸爸打的那条小船就是他们的家。船停在哪就睡在哪,从小习惯了风里来浪里去。直到1969年底,政府划了50亩土地,给渔民盖了平房,他们才得以在湖边定居下来。(下转A10版)